

威海海防圖

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

戚其章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

戚其章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338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书号 11275·9 定价 1.40元

序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的。这次战争的失败，极大地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它宣布了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政府腐朽卖国的真面目，因而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研究这段历史，分析其失败原因，科学地总结其经验教训，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最初的兴趣是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开始接触中日甲午战争问题是在1956年。这一年，我认识了原北洋舰队来远舰的水手陈学海。这位八旬高龄的老人是我学习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他的启迪下，我对中日甲午战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乎走遍威海、荣成沿海的山山水水和村庄，凭吊战争遗址，走访战争参加者，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口碑和文字资料。那本肤浅的小册子《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一版），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此后，我便真的转入了对中日甲午战争史的学习和研究。不想来了十年动乱，我的所有文稿和一些珍贵资料皆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四人帮”垮台后，一切才又从头做起。

这个集子所收的二十七篇文字，全部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陆续写成的。其中，约有半数以上在报刊上发表过。收入这个集子时，除少数几篇在内容和文字上略作修改外，其余大都保

留着原来的样子。是书之得以编成，多亏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提
拔和一些朋友的鼓励。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深挚的谢意。

当这个集子编成之际，不禁忆起了我学习中日甲午战争史
的启蒙老师、已在二十年前去世的陈学海老人，是他使我与中
日甲午战争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之所以能够在此项研究中贡
献绵薄之力，是同他的帮助分不开的。这个集子就算是我奉献
给老人的一件纪念品吧！

感 其 章

1982年12月19日于济南

目 录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	(1)
中日甲午战争	(17)
甲午丰岛海战史实考	(24)
甲午丰岛海战中的爱国英雄高善继	(39)
甲午黄海海战始末	(44)
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	(59)
刘步蟾黄海战绩考	(72)
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	
——兼与董蔡时同志商榷	(86)
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	(106)
北洋舰队布阵举要	(122)
略论邓世昌的爱国主义	(139)
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	
——与季平子同志商榷	(147)
《冤海述闻》研究	(164)
甲午山东半岛防御战	(188)
甲午威海海战始末	(206)
试谈甲午战争期间威海守将不和的原委	(221)
谈丁汝昌的《致戴孝侯书》	(231)
有关戴宗骞史料三种	(237)
跋《祭乙未殉难诸公文》	(246)

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	(249)
甲午战争失败与清朝财政	(270)
甲午战争与中国的觉醒	(285)
甲午战争人物评价问题	(293)
甲午战争海军人物传	(309)
《清史稿·丁汝昌传》订补	(394)
甲午威海之战陆军将领传略	(414)
从甲午战争史研究谈史学方法的几个问题	(430)

附录一：三十年来甲午战争史研究概况及争论的问题

附录二：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持续了大约三十年之久，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动有两个口号：一曰“自强”，一曰“求富”。在“自强”的口号下，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并创建了近代海军。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目前史学界正围绕着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究一下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近代海军，可能会有助于讨论的进一步开展。

（一）中国创建近代海军的社会背景

清朝原先只有旧式水师，没有近代化的新式海军。海军的兴建，是由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引起的。

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我国便开始了最早的买船活动。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广州查禁鸦片。为了加强海上的防御，以防范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他曾从美商手里买进一艘一千零八十吨的商船，改为兵船使用。这是中国购买西方船只的开端。与此同时，林则徐还捐资仿造西船。到1840年4月，即建成了两三艘。这又开我国建造西式船只的先例。当时买船和造船的目的，都是为了防范西方的侵略。

到五十年代，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集团为挽救分崩离析的局面，一面调兵遣将对太平军进行围剿，一面则购买西方船只配合进攻。由上海江海关税

务司英人李泰国经手，曾先后买进铁皮轮船和炮舰各一艘。清政府起初还没有自办海军的意思，主要是雇佣西方轮船，对太平军进行“水面攻剿”。但是，这些雇佣的外国船只听命于其本国政府，甚至有时“大为掣肘”，使清朝当局十分恼火。恭亲王奕䜣说：“借兵剿贼，流弊甚多，若只购买外洋船炮，尚属事权在我。”①于是想自办海军了。

自办海军需要火轮船，是设厂自造，还是向外国购买？总理衙门的满族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认为，军情孔亟，自己设厂造船“非年余不成”，缓不济急，不如直接从外国买船，“剿办更为得力”②。曾国藩也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③于是，清政府便决定“购买外国船炮，以资攻剿”④。时值已升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休假回国，总理衙门就委托他在英国承办购船事宜。1863年，共用银一百零七万两，购妥中号兵船三艘和小号兵船四艘。清政府拟派巡湖营总兵蔡国祥统领这支舰队。不想李泰国竟擅自任命英国军官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私立合同十三条，规定舰上军官、炮手、水手的选用概由李泰国、阿思本决定；他们只对清朝皇帝负责，皇帝的谕旨还须经李泰国转达，“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⑤。这实际上是妄图把这支舰队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此事揭出后，顿时朝野大哗。总理衙门也认为：“所立合同十三条，事事欲由阿思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尤为不谙体制，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1卷，第1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222页。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4页。

④《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241页。

⑤池仲祐：《海军实记·购舰篇》。

难以照办。”①于是令将舰队驶回英国变卖。李泰国以“办事刁诈，以致虚糜巨款”②，被革去总税务司职务。清政府出于镇压太平军的目的，初次试办海军，就这样落了空。

买船办海军的计划失败后，清政府便开始转向设厂造船来筹建海军了。1866年2月，太平军失败。6月，左宗棠向清政府建议设立福州船政局，开厂造船。他的建议是从加强海防以防范外国侵略的角度来考虑的，如说：“各国向以船炮称雄”，“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③福州将军庆春也说：“闽厂制造兵轮船，原为捍卫海疆起见。”④福州船政局的设立，便为中国建立近代海军初步奠定了基础，故有人称之为“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⑤。由此也可看出，此次设厂造船办海军的宗旨，与三年前买船办海军以镇压太平军为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清政府设厂造船办海军，本是为了防范外国的侵略，但自从设厂以来，到1874年为止，才只造了十九艘船。另外，从国外又买进了十艘。这些船，由于吨位很小，装备陈旧，加之分散各处，缺乏统一的指挥，只能用于沿海巡缉，根本无法抵御外国的海上侵略。是年5月，便发生了日本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事件，日本政府竟然设置台湾事务局，任命长官，并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侵略军三千人在台湾南部琅峤（今恒春）登陆。日本对台湾的侵略行动，刺激了清朝当

①《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247页。

②《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257页。

③《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18—19页。

④《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397页。

⑤池仲祐：《海军大事记》。

局，开始觉察到日本势将“为中国永久大患”①了。许多官员认为，日本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出兵侵略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②。甚至提出“购办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③。福建巡抚丁日昌更指出：“现闻春夏间日本在英国新购铁甲船二号，均已制成下水。该岛距泰西远而距中国近，且亦断不敢与泰西为难。然则彼竭倾国之力而制此利器，其意果何为哉？”④可见，当时清政府决定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军的力量，确实是“隐为防御日本之计”⑤。李鸿章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⑥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许多有识之士也深感有组织海军舰队的必要。如说：“方今外洋环伺，迭起衅端”，“彼所以肆意要挟者，亦以我之海军未立也”⑦；“挫外夷之凶焰而折其谋，而其端则必自海军始”⑧。因此，可以这样说，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发展。

有些论者认为，洋务运动办海军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揆诸史实，这是没有根据的。本来，作为国家政权的主要支柱的军队，有对内和对外双重职能。洋务运动期间所办的海军，自不例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主要的职能是对外，而不是对内。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9卷，第32页。

②《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337页。

③《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369页。

④《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370页。

⑤《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338页。

⑥《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498页。

⑦《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第28页。

⑧《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第32页。

(二) 筹办近代海军的过程

自从发生日军侵略台湾的事件以后，中国筹办近代海军的步伐便加快了。最初，江苏巡抚丁日昌①提出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建议成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除赞同丁日昌的意见外，还建议三洋各设铁甲船二艘，以提高海军的质量和装备水平。此后，筹办三洋海军的活动便开始了。

在筹办三洋海军的过程中，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曾发生过两次激烈的争论：

一是关于购买铁甲船的争论。根据李鸿章的建议，三洋各购买铁甲船两艘，共购买六艘。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实行，中国近代海军的力量将大为改观，甚至会影响到后来甲午战争时海军的胜负问题。试看，中国仅有两艘七千多吨的铁甲船定远和镇远，日本海军尚畏之“甚于虎豹”②，何况有六艘呢？但是，李鸿章此论一出，赞成者固然不少，反对者亦大有人在。反对者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主张绝对不能买，既“不可购买洋船，并不可仿照制造”，认为“铁甲船有害无利”，甚至说什么“岂有必效敌人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③，这种迂腐之谈，主要是来自守旧的顽固派。二，从经济方面着眼，以财力不裕，碍难实行，如说：“筹办洋人铁甲船，经费太巨，即使得力，海洋辽阔，必得若干铁甲船，始足弥缝其阙。此船一办，每年一切耗用必多。”连奕诉也认为：“中国

①丁日昌于1875年后调任福建巡抚，此时尚在江苏巡抚任上。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169页。

③《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152、252页。

现尚无此财力，未能定购。”①这场争论持续了六年之久，才由清政府最后拍板定案，即采取折衷的办法，函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厂订造两艘铁甲船，这就是后来的定远和镇远。

二是关于买船和造船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既反对买船，又反对造船，认为压根儿就不应该“师夷长技”，这是顽固派的意见。第二种，以造船费重为理由，请朝廷下令暂行停止造船。这派意见以内阁学士宋晋为代表。第三种，认为“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②，“为目前计，只得购之洋人，为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③，主张买船与造船并举。这派意见以左宗棠为代表。李鸿章在造船与买船问题上的主张始终是摇摆不定的。他先是不主张买船，于1872年曾向朝廷建议：“请饬沿江海各省，不得自向外购船，如有所需，向闽、沪二厂商报订制，以节度支。”④过了两年，他又提出：“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⑤其实，李鸿章的说法乃片面夸大之词。统计资料⑥表明，中国自造炮舰比买的便宜得多，质量亦可；自造的旧式快船比买的略便宜一些或工价大体相抵，质量不相上下；自造的新式快船，虽然比买的便宜，但质量太差，实际上仅是加了一层钢甲的旧式快船而已，而同买进的旧式快船相比，其费用确实将近“倍于外洋购船之价”。所以，根据当时的工业生产和技术水平，要制造新式快船和铁甲

①《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337页。

②《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443页。

③《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29页。

④《清史稿》，第136卷，《海军》。

⑤《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47页。

⑥参拙作《北洋舰队》，第24页。

船还是不行的，要改善海军的装备质量，这两类舰起初非向外国购买不可。至于炮舰和旧式快船，则无需到外国去买。由此可见，在上述三种意见中，第三种意见既考虑到海军将来的发展，又考虑到眼前的急迫需要，是比较中肯的。争论的结果是，清政府决定向英、德两国分别订购舰只，以加速海军的建成。

到1884年，三洋海军已初步建成：福建海军拥有舰只十一艘，九千八百五十七吨；北洋海军拥有舰只十四艘，一万零九百八十吨；南洋海军拥有舰只十八艘，二万一千二百八十七吨。三洋海军共有舰只四十三艘，合计四万二千一百二十四吨。按吨位来说，这似乎是一支可观的海军力量，可以在反侵略战争中发挥相当的作用。但是，三洋海军建成伊始，便暴露了带有根本性的两大弱点：一、三洋海军皆自成系统，指挥不能统一，加之力量分散，易被敌人各个击败。左宗棠说：“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①后来，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调北洋舰队支援台湾守军，李鸿章托词不就；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又调南洋海军派数舰充实北洋舰队的力量，刘坤一则借口长江一带防务紧要，迟延不行。此类事情之得以发生，皆植根于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左宗棠倒是颇有点预见性的。二、三洋海军从表面上看来舳舻相接，声势夺人，其实力量相当虚弱。例如，福建海军大都是小型炮舰，只有旗舰扬武是快船，才只一千五百六十吨。北洋海军情况差不多，只有旗舰超勇及其姊妹舰扬威两艘快船，亦仅一千三百五十吨，而且是外包钢板的木质结构，防御力忒弱。南洋海军情况略好一点，但也强不了多少。这样的海军，在对外防御上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①《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114页。

面对这种局面，清朝当局倒也不是熟视无睹。因为按既定的筹建三洋海军的方针，工作齐头并进，而又限于财力，必然会出现这种局面。所以，清朝当局也深感有改弦更张的必要。早在1879年，清政府即确定“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①。并曾规定，筹建海军的经费由粤海关、江海关和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六省的厘金内，每年提取四百万两，头两年统归北洋支配，以后则由南北洋各得半数。1884年8月，福建海军遭到法国舰队的突然袭击，十一艘兵船同时俱尽，这就是著名的马江海战。清政府总结前此的教训，于1885年6月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李鸿章立表赞同，誉之“洵为救时急务”^②。与此同时，清政府决定收回海军的统一指挥之权。是年10月，设海军衙门，任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汉军都统善庆和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海军衙门设立后，实际大权仍操在李鸿章手里，他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把北洋海军的建设推向了最高峰。

从1885年以来，北洋舰队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新舰猛增，大都是从国外购进的。新购进的舰只主要有三类：铁甲船、新式快船和鱼雷艇。这些舰只都是当时中国尚不能自造的。四年之间共添置新舰艇十四艘，其中铁甲船定远、镇远两艘，新式快船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五艘，以及鱼雷艇七号。于是，北洋舰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质量上，都有所提高。到1888年9月，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此时已拥有大小舰艇近五十艘，约五万吨了。

①《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387页。

②《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565页。

北洋舰队成军之初，其实力超过了日本海军。当时，日本只有十七艘军舰，可以作战的仅五艘，而且其中三艘机器陈旧，速度迟缓，已非海上利器。可是，日本政府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从此锐意扩充海军，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特别是1891年以后，日本在三年间添置了战斗力很强的战舰六艘，其中有铁甲船严岛、松岛（旗舰）、桥立三艘，新式快船吉野、秋津洲、千代田三艘。这样一来，日本海军的实力反倒超过了北洋舰队。而北洋舰队成军以后，清政府即决定停止添置新舰，并且不许装备更新。奕譞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则趁机挪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把海军建设完全弃置不顾了。因此，北洋舰队成军之时，亦即它停止发展之时。到甲午战争前夕，连李鸿章本人也似乎觉察到，在中日两国海军力量的对比中，中国已屈居劣势。然事到如今，徒唤奈何，他只能发出“窃虑后难为继”①的哀叹了。

纵观清朝筹办近代海军的过程，从1860年曾国藩建议办海军，到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历时整整二十八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不仅如此，这支近代海军在诞生和成长的过程中，几经曲折，历尽坎坷，先天就是不足的。当洋务派的首领们陶醉于海军表面的军容之盛时，其实他们已为自己的“得意之作”埋下了毁灭的伏根。

（三）洋务运动时期海军的性质

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近代海军，究竟是什么性质？对此，大家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些论者认为，反动性是它突出的特征，因而给以全盘否定。这恐怕是不够妥当的。军队作为

①《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第193页。

封建国家统治的工具，从本质上来说，当然具有反动性。海军自不例外。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不应从定义出发，而应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

或以为，洋务派办海军是打算“挟以自重”。这种打算不能说没有，但重要的问题并不在这里。“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①虽然个人的主观愿望对历史的进程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来，它并不能支配历史的进程。例如，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采取“避战保船”政策，可是北洋舰队还是在黄海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决战。可见，洋务派首领打算“挟以自重”是一回事，海军本身的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或以为，洋务运动时期的海军“是在外国侵略者严密控制和操纵之下的”，它本身就是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产物。这样说，恐怕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帝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海军，这是真的；他们的企图往往受到抵制而难以得逞，这也是真的。在近代海军创建之初，清政府即制定了“一切调度机宜、事权悉由中国主持”②的原则。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基本上未逾越这条原则。李泰国之被革职，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是不会从此放弃他们的野心的。他们指望把总教习的席位抢到手，从而控制中国海军。为此，英、德、美等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活动。以北洋舰队为例：先后共有六任洋人总教习。其中英人琅威理两度任职，时间长达五年之久。在琅威理聘任之初，赫德即嫌其无权，提出“须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②《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249—250页。

调派弁勇之权”①。结果又如何呢？据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记》载：1890年初，北洋舰队巡泊香港，“丁汝昌尝因事离舰，刘子香（步蟾）撤提督旗而代以总兵旗。时琅威理任海军总教习。挂副将衔，每以副提督自居，则质之曰：‘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何为而撤提督旗？’刘子香答以‘水师惯例如此’。”琅威理不服，“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②。从这次琅威理争挂督旗事件，我们可以得到三点认识：一、按《北洋海军章程》，北洋舰队的编制只有提督一员、总兵二员，而提督和总兵只能由中国将领担任。提督在舰，悬挂督旗；提督离舰，改悬镇旗。旗是权力的象征。所以舰队的指挥权是在提督及总兵的手里。刘步蟾以提督离舰而撤督旗，代以镇旗，系按《章程》办事，做得有理。二、李鸿章宁肯开罪洋人，也不敢公然违背《章程》，只能“复电以刘为是”。三、总教习连悬旗的资格都没有，焉能“严密控制和操纵”北洋舰队？关于琅威理，英国专栏作家于得利说得很对：“他的支配权最多只及于船舶运用术及炮术而已，至于行政则由中国人掌握最高权。”③其实，在觊觎北洋舰队领导权问题上碰钉子的总教习，何止琅威理一人！他的后任德人汉纳根，不也是因要求以提督衔任北洋舰队副提督掌握指挥权而碰壁辞职吗？可见，一般认为洋人总教习是帝国主义控制北洋舰队的象征，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上述可知，清政府尽管在许多场合对帝国主义妥协、屈服，但在海军的领导权问题上却从来是寸步不让的。

事实上，为解决海军驾驶、轮机、炮火等方面技术人才缺

①《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第301页。

②池仲祐：《海军大事记》。

③《洋务运动》丛刊，第8册，第441页。